

聂荣臻：寻得终生信仰，写下“报国家书”

本报记者王晓瞳

“我常常想起父亲，我常常梦见父亲。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，他坐在那把旧了的轮椅上，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；他微笑着望我一眼，一言不发，而后，他微微抬起头来，深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。”

在女儿聂力的回忆里，父亲聂荣臻在晚年常常是这样的姿势——静静地、深情地向着远方的天际仰望。

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聂荣臻，半生戎马，半生钻研。为新中国的创建英勇奋战，淡泊生死；新中国成立后又排除万难，组织和领导了“两弹一星”事业。他是毛泽东口中的“厚道人”，是全国百姓爱戴敬仰的“福帅”……

而在聂力心中，父亲的荣光都始于那个壮志满腔、远渡重洋找寻理想使命的风华青年。

1919年11月下旬的某天上午，20岁的青年从老家登船启程。小火轮开足马力，迎着初升的朝阳向东驶去。

青年志在远方——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”

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立志时。”这句座右铭，被十几岁的聂荣臻刻在了课桌上。

聂荣臻的故乡位于重庆市江津区(原四川省江津县)吴滩镇石院子。如今，走进故居所在的吴滩镇郎家村，林木葱郁、流水潺潺、风光秀丽，小村正在推动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。但在聂荣臻心里打下深深烙印的，并非家乡美丽的山水风光，而是日月的艰辛、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。

出生于1899年12月29日的聂荣臻，童年便经历了国家政治的激烈动荡。《聂荣臻元帅回忆录》一书中写道：“以辛亥革命为标志，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，封建社会正在瓦解，民主主义正在兴起。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动，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堂政治课。”

进入新式学校读书后，聂荣臻接触到数学、历史、地理等课程。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困落后，国家的出路何在？



聂荣臻元帅陈列馆。 何磊摄

1918年端午节，聂荣臻与七八个同学一起租了只小船，畅游长江。面对滔滔江水，同学们纷纷感慨万千。聂荣臻吟诵起屈原《离骚》中的诗句：“不抚壮而弃秽兮，何不改乎此度？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！”

在剧烈摇摆的小舟中，聂荣臻对同学说：“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，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。诸君将来再聚时，要有所成就方不负我们同窗之谊。”

五四运动爆发后，积极投身当地学生游行示威运动的聂荣臻上了当地军警的“黑名单”。以“在家有被捕的风险”为理由，他终于说服了父母，同意他去法国勤工俭学。

年轻的聂荣臻想，出国去学点本事，回来好办工业，使国家富强了，也许能改变社会的局面。

离家的那一天，母亲将一坛醇酒埋在院子地下，说好等他回来时挖出来，摆酒接风。

“荣臻，啥子时候能回来？”母亲问。

“多则5年，少则3年，我就会回来的。”

离开家的青年没有想到，此一去，他再也没能踏进这道翠竹掩映的院门，父母也就再也没能见到自己唯一的儿子。

探索实业救国——“要让自己的火车在祖国的土地上奔跑”

船到汉口，聂荣臻约上几个同学去看火车。他们兴奋地赶到车站，很不凑巧，站上没有火车。听说趴在铁轨上可以听到远方火车行驶的声音，他们赶紧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铁轨上。

隐隐听到一阵又一阵“嗡嗡”声，聂荣臻想，那大概就是火车行驶的声音吧。

他们说，从法国回来，也要在四川修铁路，让自己的火车在祖国的土地上奔跑。

在法国，聂荣臻一边学习法语，一边学习数理化等课程。积蓄将用完的时候，就赶快找工厂做工，手头有钱，就进学校；钱花光了，又赶快做工。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间，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，但1921年之前，“实业救国”的想法仍在聂荣臻的脑海里深深扎根。

多年后，指挥“两弹一星”事业的聂荣臻回忆说：“热爱科学技术，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。经过革命战争，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，正是实现

这种凤凰的好时机。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。”

1921年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发起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，包括“二八运动”“拒款运动”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。眼看着蔡和森、陈毅等同志被遣送回国，幸运躲过的聂荣臻仍有想进学校继续读书的想法，恰巧听说比利时的沙洛瓦有一所劳动大学，专教机械、化工这些课程。第二年暑期，他便参加了劳动大学的入学考试，进入化学工程系学习。

学校设备齐全，实验室很大，师资力量雄厚。在这里，聂荣臻不用一面勤工一面俭学，可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学习。

本该感觉“如愿以偿”，但聂荣臻却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了。

“我的思想这时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。”聂荣臻后来回忆。

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多次激烈辩论，以及1921年开展的几次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场面，不断浮现在聂荣臻的面前。他翻来覆去地思考着：“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，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，即便是成为工程师，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寻得终生信仰——“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”

1922年6月，聂荣臻在比利时给父母写了一封信。

“男也，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，而拯父老出诸水火，争国权以救危亡，是青年男儿之有责！”

聂荣臻逐渐感到，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所控制，要发展民族工业，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，只能是一种幻想。

“况男远出留学，所学何为！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，而在四万万同胞均有衣有食也。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，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。”

在比利时，聂荣臻阅读了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国家与革命》《共产主义ABC》等著作。他清醒地认识到，只有建立革命政权，实行社会革

命，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，知识分子才能有报效国家的机会，国家才能富强。

“此男素抱之志，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！”这封信，是聂荣臻的宣言书，也是他早期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。

他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。在刘伯坚、熊味耕的介绍下，聂荣臻加入了周恩来、赵世炎发起组织的旅欧“少年共产党”。“为了保密，每个人互相通信或发表文章都用化名。我的化名叫‘向上’。”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。

随着组织的工作越来越多，聂荣臻碰到了学习专业知识和进行革命工作的矛盾。沙洛瓦劳动大学的考勤表上，多次注明他“不大上课”。聂荣臻酝酿着，一个人精力有限，又要学习专业、又要做革命工作，长此下去，不是个办法，干脆放弃学习，集中精力做革命工作。

1923年春，经赵世炎、刘伯坚介绍，聂荣臻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“至此，我的父亲才算是真正地启航了。”聂力写道。

1924年2月5日，甲子年正月初一。25岁的聂荣臻同周恩来、李富春、邓小平四人相约，坐上通往贝尔—拉雪兹公墓的专程车，去瞻仰著名的“巴黎公社社员墙”。

神情肃穆地站在“社员墙”前，聂荣臻举起右拳，庄严宣誓：“我为自己终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由衷高兴。我要一辈子信仰、坚持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！”

在《山高水长——回忆父亲聂荣臻》里，聂力这样描绘当时的景象：

“他们宣誓的那一刻，不远处的树丛中，‘扑棱棱’飞起一群鸟儿，也不知是什么鸟儿，它们舒展着翅膀在纪念墙上空盘旋几圈，然后直插蓝天。”

“许多年之后，父亲仍然忘不掉那群鸟儿盘旋飞升的影子，它们开始是舒缓的，后来快如闪电，宛若人生的轨迹。”

将帅少年时

涂普生

二十世纪，三十年代，世人谁可淡忘？东瀛来寇，丧心病狂，铁蹄蹂躏吾邦。大地蒙羞，山河有泪；苍天滴血，日月无光。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蒋家奉为“锦囊”。黑云压城城欲摧，民族旦夕临危亡！卢沟狮吼，敌忾同仇；抗日烽火，风雷激荡。舆论重压，西安化解危机；国共合作，同赴抗日战场。

汇五省游击之骁勇，雄踞江淮；合八区抗日之重城，共战顽敌。叶挺项英主将在，铁军雄师神威扬。新四军投钢刀于日寇，刺利剑于伪汪。纵横驰骋名，大江南北、淮河两岸；出没隐显兮，密林荒野、芦荡湖塘。马路羊肠，敌攻而据地利；僻野闹市，杀寇以操刀枪。或如襁褓沿道，或如神兵天降。有忠肝亮剑，如猫手捕狼，民歌俗曲，童叟能详。手抄于破布草纸，流传于十里八乡。试看千门万户，携来箪食壶浆。

反之之风云莫测，报国之事业逢殇。狼子露狰狞之面目，沐猴脱君子之伪装。皖南事变，海内悲凉。新四军奉令北去，茂林地惨遭炮枪。敌兵布网，名将拒降。新四军被销番号，我中华痛失栋梁！

于是陕北通电，义晓八方。讨蒋之声复震，许国之道弥昌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军得再生之纲。铁血军魂，英烈义胆；金戈铁马，又谱华章。兴壮业而集勇士，树旗旗以开闾王。苏北盐城，青史彪彰。同瞻此地，新四军重建军部；遥想斯时，众将士再战凶狂。陈毅、少奇同志，临危受命，热血尤增坚毅；铁肩更显担当。于是发难事热，国人争传真相；反共潮落，蒋顽难掩恐慌。

已而利剑出鞘，敌魂飞而胆破；重任在肩，我虎奋以龙骧。十四年抗战，腥风血雨；万里疆场，愈战愈强。万众之心耿耿，英风浩浩；十四载之功赫赫，战绩煌煌！东来寇损兵折将，中国人气吐眉扬。

雄师业显，军歌韵长。风雨携彩虹并美，和平为世界致祥。纪念中共百年之华诞，不忘先烈奋斗之荣光。志上新征，何惧梯风沐雨；情牵国运，还需秣马整装。看我军强疆固，民富国昌。中华圆梦，再醉琼浆！

《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赋》编辑委员会供稿

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赋

序 跋

闵凡路

我这一生，与传媒相伴，与写作结缘。写新闻，写评论，写诗，写赋，写书；写时代，写故乡，写人生，写祖国，写世界，笔耕不辍，乐此不疲。我编报纸，编杂志，编导电视，阅文无数，识人无数，交友无数，与我的写作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

蓦然回首，60年的文笔生涯，上千万字的海量文稿，伴我人生，收获满满。

我赶上了一个伟大时代。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时局动荡的东北边陲小镇，童年经历了伪满统治，日本投降，土地改革，东北解放战争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，我正在柳河县城上初中一年级，跟游行队伍上街庆祝。上世纪50年代，我上高中和大学，历经抗美援朝，经济恢复，中苏友好。1956年中共八大过后，我在大学二年级入党。到新华社工作的50多年间，经历过大跃进、人民公社，三年自然灾害，中苏论战，中美建交，文化大革命、拨乱反正，改革开放，苏联解体，海湾战火，金融危机，“9·11”事件，伊拉克战争，中国崛起，新冠疫情，中美交恶，全国脱贫，全面小康，以及5G时代……

我跟随着新中国70多年砥砺前行脚步，尝受过我们国家挨饿、挨打、挨骂的滋味，感受到中国人民从翻身解放，到改革开放，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辉煌。我为我的祖国繁荣富强而兴奋，而自豪，而高歌。

这是一个天地翻覆、乾坤巨变的大时代，中华崛起、民族复兴的大时代，中国人民大有作为的新时代！置身于这个伟大时代，有太多东西可写，有太多话可说，有太多感动需要倾诉表达。

我读高中时就喜欢作文。我的语文成绩是全班最好的，在通化中学校作文比赛中获奖。1954年高考作文题是“我的理想”，我写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、一名作家。我报考第一志愿北大中文系，未果，被第三志愿哈尔滨外语学院录取，学俄文。大学期间，我俄语成绩优秀，但仍然热衷于写散文，写新诗，读文学著作。

人生有幸。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，进入中国新闻业界的顶级殿堂。在做新闻翻译和《参考消息》编辑的时候，我依然想当记者，也曾向有关领导表达过这种愿望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终于被派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、辽宁分社，当了两年记者。在大庆油田，在鞍钢炼厂，在东北电网，在松江平原，我

文笔生涯六十年



《闵凡路文集》。 作者供图

采访锻炼，写了不少通讯和采访札记，圆了我的记者梦。

1980年1月，《半月谈》初创，我奉调回京，当了13年主编、总编辑。领导班子很强，李峰、叶佐林、喻权域、于海等同心协力，杂志越办越火，发行量高达700万份。在此期间我写了百余篇时政评论，评改革开放、评社会万象、评世界风云，写作水平有了进一步提升。

主编《半月谈》的13年，是我40多年新闻生涯中的黄金岁月，我被评为“十佳编辑”、高级编辑，获韬奋新闻奖提名。

1992年8月，我调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兼国内部主任，成了“记者头”，组织报道、编审稿件。我参加党的十四大报道、两会报道、“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”报道、长江三峡大江截流报道，以及一些典型人物和事件报道，舞台更大，眼界更宽。与此同时，我又受命筹办于1993年1月1日创刊的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，兼任总编辑。虽然做业务领导工作较忙，但我从未放下手中的笔，不停地写作。新华社为我颁发了“国务院特殊津贴”。岁月几何，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如今已成为百万级中央大报。

新华社原副社长缪海陵，是位老延安，也

是位大诗人。他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张罗创办“新华诗社”，也找到了我，还不定期出版诗刊《新华诗叶》。海陵、张结、苏仲湘、杜运燮、周笃文、林岫、张万舒、蒋有泉、卫元理等一大批新华诗人聚在一起，诗兴大发，抒写江山多娇、壮志豪情。我担任诗社副社长，在写新诗的同时，也学着写旧体诗。

时代在前进，媒体也与时俱进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还在半月谈杂志社的时候就建起电视部，后来变成新华音像中心，是新华电视的源头。1998年我退休时，时任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同我谈话，让我继续帮助社里管管电视业务，担任新华音像中心(后更名为新华社音视频部)顾问，又干了6年。在这里，我参与策划了几个大型系列电视音像片《今日世界》《思想解放史录》《百年百事》《大使》，以及《60分钟杂志》《参考消息音像版》《时事报告音像版》，我还写了一些电视评论文章。

到了2004年，我70岁了。我向社领导提出，不再担任音视频部顾问，正式离开新华社工作岗位。

走出新华园，本想颐养天年，优哉游哉。外面的朋友却纷纷找来，要求我协助办刊物。我又先后担任《华商世界》《法治中国》《环球纪事》的总编辑，拓宽了我经济、法律方面的知识 with 见识，也写了一些相关评论。

创办《中华辞赋》，是2008年的事。我与袁志敏先生商谈创办《中华辞赋》杂志，又把刘忠德、程树榛、张结、周笃文、黄彦、吴昊、关山、张虎、董玉华、王铁等请来座谈，大家赞成办《中华辞赋》，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决定由原文化部部长刘忠德任编委会主任，我担任社长，黄彦任总编辑，袁志敏、周笃文、吴昊任副社长。这时我开始写赋，写赋评。我写的第一篇《乐天赋》和第二篇《商旅赋》，都是由我原来的散文诗改写成赋的。由此上路，连续写了一系列的赋文，也成了“辞赋家”了。

《中华辞赋》出手不凡，赢得专家和业内人士的评赞。试刊的第6个年头即2013年，中央特批了一个正式出版刊号，杂志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。我又做了7年总编辑。我读赋、学赋、研究赋、写赋、评赋，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一文体。我倡导的“古赋为体，今辞为用”“为时代而歌，为人民而赋”的创作理念，得到辞赋界的认同。我写的《世界和平赋》《中国改革开放赋》《中华复兴赋》《新中国赋》《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赋》《中共党

新四军赋